

亞爾薩斯的選擇



語言是個人自小至大思想感情靈魂的表現，強制學習或禁絕某種語言就是對一個人的思想、人格最徹底的否定與踐踏，是蓋在靈魂上的烙印，最能激起強烈的反感。

亞爾薩斯對國人來說不是陌生地方，都德寫的《最後一課》描寫此地新的統治者壓制異族文化，並強迫人民接受新的語言文化，被統治的人民或渾然不覺而被同化，或無力抗拒而心懷憂憤。統治者一向把文化當作牧民工具。亞爾薩斯在德法之間五度易手，文化調適與國族認同的苦惱，譜出百年的歷史悲情。

亞爾薩斯東邊隔著萊茵巨川銜接德國黑森林，西邊由伏日山與法國有所區隔。德法兩民族在此碰觸，法語稱德國人為 *Allemand*，原是指亞爾薩斯人。這獨特的地理位置，註定了德法相爭的歷史宿命。隨著政權交迭而文化流轉，留下痕跡，不難想像此地人文景觀和文化氣質兼具德、法風味。

山巒起伏，村莊紅瓦隱現於山谷綠蔭，教堂尖頂矗立於廣袤葡萄園。德國式的木樑桁架房子，錯落在黃瓦赭牆的法式農舍，市集裡交雜著德語與法語叫賣聲，居民舉止容貌，似乎也融合了德式的嚴謹自律與法式的隨和優雅。

當地人對家鄉的風景頗為自豪，自稱伏日山是上帝所創造最溫柔的山巒，也是天使歇腳之處，天使玩累了，就鼓著翅膀飛到這裡休息，他們的眼睛如藍寶石般發光，因此山風特別輕柔，天空特別蔚藍。

史懷哲的故居位於凱撒斯堡（Kaysersberg），是本地典型的村莊，三面環山，教堂鐘聲迴盪於四周葡萄園，山坡上廢棄古堡，傾圮石牆透出歲月滄桑。清澈溪流潺潺穿過村莊，河上石橋立著聖母瑪利亞神龕，水流推動著磨坊緩緩拍動。故居紀念館為樸實民宅，史懷哲塑像傍著非洲行醫器物，環繞參天古樹瀰漫一股安靜、平淡又深邃的氣氛。村莊入口處，停著一部二次大戰遺留的坦克，顯示恬靜的田園風景下，隱藏著血淚交織的歷史。

政治的選擇

政權更迭在人民的共同記憶深處，留下歷史刻痕。亞爾薩斯大部分居民的血統、語言較接近德人，13世紀到17世紀屬於德意志自由市，三十年戰爭後始併入法國。所以當德人於1870年普法戰後取回亞爾薩斯時，對於法人而言，是異族侵略，從德人觀點，正是光復故土。但當地人民並沒有回歸祖國的歡欣鼓舞，反而「嬰城固守尚四十餘日到糧盡戎竭，才勉強納降」（梁啟超文）。歷史上每當亞爾薩斯人被迫在德國與法國之間做選擇時，總選擇法國，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居民更是興高采烈歡迎法軍。

為什麼德裔的居民反倒較認同於法國的統治呢？這心理的變化源自法國大革命。

在 18 世紀，壓迫歐洲人民的重擔來自修道院的特權以及封建貴族的聚斂，在德國與法國境內並沒有太大差別。法國大革命首揭「人權宣言」，將政府的貪污腐敗，歸因於對於人權的無知與不尊重。該宣言受到飽受壓迫的亞爾薩斯農民的歡迎。

「人權宣言」宣稱「人生而自由平等」，並不專指特定族群的權利，而是指一般人民的公民權。依當時的革命理念，各民族應享有獨立主權，但組成民族的要素並不在於血統與語言，而在於共同的公民權，合組國家以對抗私益與特權。在此標準下，無論亞爾薩斯人屬什麼血統、說什麼語言，都不妨害他們享有法國公民權。這樣的革命理念，贏得了不同族裔歸心。

1790 年亞爾薩斯與其他地區的國民軍共同立誓效忠「民族、法律、與國王」，並宣稱自此之後他們不再是普羅旺斯人或亞爾薩斯人，而是法國人，並積極參與革命行動。法國國歌馬賽曲便是在史特拉斯堡譜成。政治學者認為法國對人類歷史最大的貢獻，便是奠立了「民族」是公民審慎選擇的政治產物，而不限於血統與語言。這個革命性概念完整呈現在美利堅合眾國與瑞士，也確立了亞爾薩斯人的政治選擇。

革命性的民族理念，不容易被一般人接受。仍有許多人認為語言、族裔才是民族的判斷標準，甚至明指亞爾薩斯人的語言與生活習慣與法國人大不相同，而且和敵人以兄弟同胞互稱，不會將法國人看作他們的同胞。史懷哲的摯友羅曼羅蘭在其名著《約翰克利斯朵夫》描繪改變血統民族意識的

困難。約翰克利斯朵夫是純潔且充滿正義感的德國人，一直把德國取回亞爾薩斯認作一件合乎正義的行為，當他的法國好友奧理維認為這是一件罪行時，他簡直弄糊塗了，他們平日相親相愛，對這個問題卻難以溝通。

奧理維質問「誰有權利說：這個民族是屬於我的，因為他是我的兄弟，如果他的兄弟否認他？即使這種否認是不應該的，那麼錯處也在於不能搏得人家的愛的那方面，而且他也絕無權強使對方跟從他的命運」，相同的質問到今天二百多年了仍未找到答案，人類文明的進程其實不見得快。法國的羅曼羅蘭曾受教於德國老太太，因此能以人道、理性的胸懷看待德法之間的衝突，卻不見容於當時盛行的愛國主義，只好寄居瑞士。同一時期，德國的赫曼赫塞也以相同理由，被迫移居瑞士。

夾縫中的土地與人民

德法兩國爭取亞爾薩斯，理由都是維護神聖領土，讓骨肉同胞團圓。諷刺的是，雙方卻競相以刺刀與砲彈荼毒這塊土地，數度在此進行焦土戰爭，摧毀了圖書館、教堂和房舍，居民受害慘烈。第一次歐戰後雙方對峙，留下馬其諾防線巨大而無言的水泥碉堡，供人憑弔。

處在夾縫中的亞爾薩斯人民，雖然是德法兩國耗盡心力爭奪的目標，可又得不到真心看待。德國人取回亞爾薩斯後，為了把人民訓練成純正的德國人，實施了嚴厲的同化政策。法國也因這裡的人民血統上接近德國，又受過德國統治，而抱著歧視和懷疑。亞爾薩斯裔居民在法國工作常受到

有色眼光看待，歷史上曾發生多次冤獄。

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時，法國對待亞爾薩斯同胞與對待敵國人民毫無差別，首先就把他們送入集中營看管，其中一位是正在非洲行醫的史懷哲。

史懷哲被遣返亞爾薩斯家鄉，在法國境內的一個火車站下車休息時，受到一群紳士貴婦們的隆重歡迎，招待珍饈美味。一會兒發現主人們變得莫名其妙的侷促，原來這批亞爾薩斯人民並不是他們真正要款待的人，他們所等候的是另一批被遣返的法國人。當他們聽到客人們不說法文而說亞爾薩斯語的時候，才恍然發覺表錯了情。不過這群失望的主人並沒有大發脾氣，反而大笑一場。客人們也都專心致力於吃東西，所以在重返旅途的時候，還相信這次盛宴是同胞特別為款待他們而設，真心受之無愧。

文化的調適與棄絕

統治者帶來的文化，慢慢滲透為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政權的變動並不影響人民相互的文化欣賞。亞爾薩斯作家 Jean Egen 回憶童年時，他父親比喻亞爾薩斯人宛如大海中的鯨魚，雖然與陸上的哺乳動物是同類，但卻習慣生活於海洋。也就是指當地人政治上認同法國，但卻自適於德國文化氛圍。

但是當極權專政的納粹在德國掌權，種種迫害人權的消息傳來，當地人民在憤慨擔心之際，也開始對身邊的德國文化感到不自在。歌德、康德與貝多芬的國度如何能與種族迫害，連小孩、女人都不放過的政權聯結在一起。

當時居民作彌撒時習慣用德文，在日常生活習慣用法文，自嘲德語適合與上帝溝通，而法語適合稱讚美食與女人。心理上慢慢覺得用德文作彌撒很不調適，因此，自行翻譯祈禱文為法文，剛開始很有滑稽之感。作者回憶他父母白天以法語大聲咒罵德國政府，到了晚上卻不自覺地唱起德語搖籃曲。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梁啟超觀察到在文化上德人占優勢，只不過因為德國是專制政體，而他們愛自由慣了，有點不願意。梁啟超特別強調這是對德國軍閥的厭惡感，並不是對於德國文化根本反對。

然而歷經二次大戰納粹德國的統治，亞爾薩斯人打從心底厭惡獨裁專制政權，更產生了棄絕德國語言、文化的念頭。造成這心理變化的原因很多，德國政府把經過異族統治過的同胞當作二等國民看待，懷疑亞爾薩斯人的忠誠度，因此把強制徵兵的十三萬亞爾薩斯男人送往最艱苦的東戰線，戰死者四萬人，以當地不足一百萬的人口而言，實在是傷亡慘重。

戰後，每當火車載運返鄉軍人抵站，鎮上女人、小孩齊奔車站，哭喊呼號，希望能找到自己的丈夫、父親。

德軍戰敗退出亞爾薩斯前並未搜刮金錢財寶或藝術品，一個狂熱的軍官命令當地居民繳出睡衣，並且揚言，雖然戰敗但仍將回來，帶走居民睡衣是表示他們將睡不安寢。

以高壓手段強迫學習德語並禁絕法語，不從者送往集中營，連日常生活以法語互道「早安」與「謝謝」都要受處罰。

語言是個人自小至大思想感情靈魂的表現，強制學習或禁絕某種語言就是對一個人的思想、人格最徹底的否定與踐踏，是蓋在靈魂上的烙印，最能激起強烈的反感。

德裔血統帶給他們的是來自母國無盡的壓迫與悲劇，人民對暴虐政治的反感，逼走對母語文化的原始嚮往。德裔的亞爾薩斯作家 Martin Graft 寫道：「亞爾薩斯是迄今全世界唯一的例子，一群人民集團自願決定變更語言與文化，以求永遠脫離德國。」、「這裡的人民雖然在血統上仍是德裔，但卻自願切斷說德語的舌頭，並願永遠棄絕其德國文化之根。」

從《最後一課》到納粹德國，以高壓手段執行同化政策，強迫人民接受其國籍與文化，最後卻導致人民厭惡，並棄絕代表該政權的語言與文化，果真是「暴政猛於虎」的另一例證。其實政治亦為文化素質之表現，殘暴的政治舉措，自然令人懷疑、否定背後的文化。亞爾薩斯人民的選擇就是體現人類普遍對軍事暴力的厭惡吧。

戰後的德國倒是能坦然接受亞爾薩斯的選擇，衣著整潔的德國遊客著迷於一半故鄉、一半異鄉的風情。德國出版的導遊書籍提醒他們：儘管亞爾薩斯的感覺像德國，但應認知這裡是法國，居民的語言與其國籍未必一致。千萬不可因亞爾薩斯人講德語，與德國有相同文化背景，就誤認為他們可能是「不夠正統」的法國人，否則可能觸犯當地人。德國這種開明、尊重的態度反而使德國遊客在此受到歡迎，人民往來密切，幾無藩籬。慶典遊行時，德、法兩國國旗共同飄揚。事實上，這種尊重基本人權的態度也正是東德人民願意歸併西德的主要原因。

亞爾薩斯母親

德法百年來的征戰內鬥造成人民死傷無數，陣亡的亞爾薩斯人已分不清到底是法國人還是德國人。當地的戰爭紀念碑造型，是母親哀悼二名陣亡兒子，一位服役法軍，另一位穿德軍制服。居民早已看穿了虛妄的民族主義其實只是為順遂霸權與領土野心，因而當地從未發生「仇德」或「仇法」風潮，德裔與法裔居民共同承受歷史命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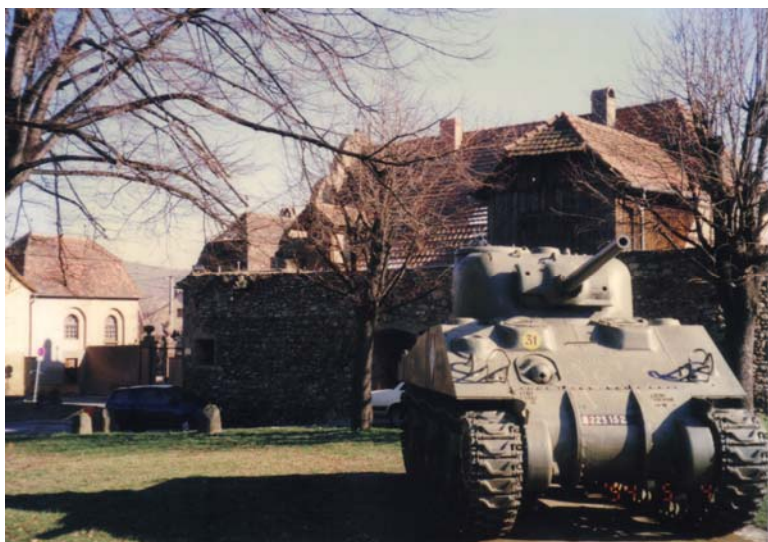
當地流傳著一個母親的故事：在納粹占領期間有位青年無故遭德軍射殺，傷心的母親在戰爭末期發現一位受傷的德國年輕士兵在河邊奄奄一息，竟將這年輕德軍帶回家裡親自照料。

在德法民族主義的夾縫中，亞爾薩斯未能成功地效法鄰近瑞士，以政治意志決定自己的命運，反而在民族主義的擺弄下歷經苦難。但經此淬鍊，轉化出更深沉的反省，以人性的珍惜凌駕民族主義，成為歐洲的良心與人權護衛，這是亞爾薩斯滄桑的歷史留給全人類的珍貴遺產。

原載自由時報，1990年11月5日



史懷哲故居紀念館為樸實民宅，史懷哲塑像傍著非洲行醫器物，環繞參天古樹瀟灑一股安靜、平淡又深邃的氣氛。



史懷哲故居村莊入口處，停著一部二次大戰遺留的坦克，顯示恬靜的田園風景下，隱藏著血淚交織的歷史。